

陶行知研究与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周洪宇 曾嘉怡

摘要：文化与教育相互包含、彼此渗透。文化是教育的根脉与灵魂，教育是文化的载体与途径。回望过去，陶行知以高度的文化主体性与教育自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理论深度融合，创立了中国近现代极具原创性的生活教育学说。立足当下，在“生活·实践”教育理念下探索学校育人方式的变革是推动陶行知教育思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由之路。放眼未来，广大教育学人应不忘先辈之志、砥砺前行，以“陶行知学”为治学根基，推动陶行知研究的专业化、系统化、科学化，坚持以“四大思维”为方法引领，锚定“十大理论维度”与“八大实施路径”，为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注入源源不断的思想养分和实践智慧。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活教育学说；陶行知研究；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024(2026)02-0003-08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大力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①《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进一步提出，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自主知识体系。^②教育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党和国家赋予广大教育学人的一项重要学术使命。为践行这一学术使命，需要坚持守正创新，融通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域外，贯通理论与实践，既守好本和源、根和魂，又积极识变、应变、求变。以陶行知研究为例，这一目标的实现，既要回望过去，深入挖掘和系统阐释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也要立足当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24年度重大项目“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理论内涵、指标体系、国际比较与建设路径研究”（24&ZD176）；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2025年度重大专项项目“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引领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2025JZDZ050）。

作者简介：周洪宇，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武汉 430079）；曾嘉怡，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武汉 430079）。

^① 习近平. 论教育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178-179.

^②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5（4）：9.

根据现实需要,推动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还要放眼未来,以陶行知研究助力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一、回望过去: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借鉴吸收外来先进理念、激活更新本土文化体制的浪潮。在思想碰撞中成长起来的陶行知,既是中西方文化交流与融通的使者,也是中国新教育与新文化的弄潮儿。他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以及教育贡献深深扎根于厚重的文化沃土,同时,他又借助教育载体来推动现代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①其中,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建构并非完全照搬西方现代教育理论的思想观点,而是扎根中国大地,从传统文化沃土中汲取了丰厚的思想养分。

(一) 从文化视角研究陶行知及生活教育学说的缘由

文化与教育相互包含、彼此渗透,体现着“一而二、二而一”的共生关系。文化是教育的根脉与灵魂,赋予其价值内核;教育是文化的载体与途径,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这一角度出发,研究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既有理论深化的必要性,也有实践推广的可行性。

第一,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文化关乎“人何以为人”的价值本源,教育则聚焦“人如何成为人”的实践路径。探讨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不仅是深化陶行知研究、赓续文化根脉的应有之义,也是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具体实践。

第二,生活教育学说是陶行知以高度的文化主体性与教育自觉,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探索生路的智慧结晶。陶行知对传统教育的批判,经历了一个由现象到本质、由局部到整体、由方法到方向的不断深化的过程。^②批判并非全盘否定,而是在承认传统文化良莠不齐的基础上,经扬弃萃取思想精华,在继承与发展中生成原创性理论。陶行知曾经明确表态“反对洋化教育和传统教育,是要开辟出一条大路,让这半殖民地争取自由平等的教育可以出来”^③,义正词严地指出“反传统教育也不是反对固有的优点,我们对于中国固有之美德是竭诚的拥护”^④,主张“人类从几千年生活斗争中所得到的,而留下来的宝贵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用选择的态度来接受”^⑤,强调“历史教训必须通过现实生活,从现生活中滤下来,才有指导生活的作用”^⑥。在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陶行知受“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启蒙,对传统教育中与民主、科学精神相悖的思想观点多持批判态度。但随着中国教育界食洋不化、仪型他国的倾向日趋严重,他便开始注重从传统文化中发掘思想精华,并将其融入生活教育学说,建构中国化和民族化的教育理论体系。自主知识体系是独立自主的主体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以自主思想为引领而构建起来的。^⑦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续和拓新,为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参照经验和实践样本。

第三,若将1920年北京大学缪金源撰写的《读陶行知先生的〈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一文视为正式起点,陶行知研究迄今已有百余年历史。尽管这一领域已经取得累累硕果,学术底蕴深厚,但有些问题依然有进一步强调的必要性。过往研究多着眼于探讨陶行知负笈游美、师从杜威,以及他

① 周洪宇. 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1.

② 董宝良. 陶行知教育学说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3: 211.

③④⑤⑥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 陶行知全集: 第3卷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5: 338, 338, 27, 27.

⑦ 郝文武. 以教育思想创新推进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24 (1): 1.

对传统教育所发起的批判，而疏于探讨陶行知自主建构且极具本土原创性的生活教育学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开展这一主题的研究工作，不仅能帮助广大教育学家准确理解生活教育学的价值意蕴，还能从陶行知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中找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与时俱进的宝贵经验。

（二）生活教育学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续和拓新

在传统教育革新和现代新式教育推进过程中，任何一位有志于教育改革的教育家，都会遇到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如何从传统文化中吸收营养，建构自己的理论、思想、主张，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的问题。^①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教育界一批有识之士就敏锐地察觉到建构中国本土化学术思想与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并为此展开了先行探索，陶行知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他从中国社会和文化教育的现实需要出发，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理论深度融合，“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以教育哲学原理为基础、以各类教育主张为内容的一套完整的生活教育学说”^②。这一学说的创立充分体现了以陶行知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突破西方教育理论的路径依赖和话语垄断，在筚路蓝缕的躬行实践中寻找本土教育发展道路的立场与追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既是理论的又是行动的，既是中国化的又是世界性的，既是通俗的又是现代的，它标志着中国现代教育理论的形成，此前的教育家可以称为教育实践家、教育思想家，但无一能称为教育理论家。^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以陶行知为代表的第一批现代教育学家对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早期探索及其成果。

生活教育学说以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为重要滋养，洋溢着鲜活的时代气息，蕴含着浓厚的民族特色。陶行知在《智育大纲》开篇即指出：“本校以诚为训育之本，亦以诚为智育之本。”^④这一理念可追溯至《中庸》“自明诚，谓之教”的教化思想，以及“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的实践精神。以“诚”为训，既可以培养学生认真求学的精神，也可以培养学生知识迁移和实践应用的能力。因此，陶行知将“诚”确立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智育标准，并将“试验”作为践行此种精神的方法，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承续和对现实诉求的回应。在陶行知看来，只有设想而没有试验，就会陷于空虚；只知应用而没有试验，又会故步自封。这种提倡试验主义教育方法的观点可追溯至荀子、王阳明等儒家圣贤，他们均强调主动探索而不是被动等待。陶行知曾经高度肯定荀子“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的哲学思想，赞叹“此数语，可谓中试验精神之窍要矣”^⑤。在此基础上，陶行知进一步将目光转向“致知在格物”这一“吾国数千年来相传不绝之方法”^⑥，通过对王阳明“格竹七日而病”关键个案的分析，为试验主义教育方法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陶行知指出，王阳明失败的缘由不在于“物无可格”，而在于“格之不得法”。对这一历史公案的重新审视使陶行知与内向心学划清了界限，并揭示了中国传统“格物”之路误入“格心”歧途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科学试验方法。

承续不是复古，而是让历经五千多年积淀的文化重焕生机；拓新不是颠覆，而是在尊重历史、文化和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发展。陶行知注重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哲学智慧，夯实生活教育学的思想基础，也依据教育的现实需要，对其中行之有效的教学理论与方法进行承续和拓新。他将“因材施教”“欲速则不达”等先贤智慧与自身在长期实践探索中积累的教育经验相结合，提出了探

① 田正平. 底色·基石·津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近代教育家的影响 [J]. 教育研究, 2024 (3): 53.

② 周洪宇. 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总序 3.

③ 李剑萍, 杨旭. 原创型教育家与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形成 [J]. 中国教育科学, 2019 (2): 118.

④⑤⑥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 陶行知全集: 第1卷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4: 70, 70, 71.

讨真理的五条路径——“体验”“看书”“求师”“访友”“思考”，即“五路探讨”治学方法。这种方法的精神内核与《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一脉相承。深植于“以教人者教己”这一学理根基的“小先生制”更是对“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先觉觉后觉”等教学主张的继承与发展。至于儒家学派“过则勿惮改”“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观点，墨家学派“亲知，闻知，说知”的认识论，以及先秦道家“真人”的理想人格、“返璞归真”的价值追求、“道法自然”的和谐共生理念等，皆经由“现实生活”过滤与萃取，最终内化为生活教育学说的文化底色与精神基因。

二、立足当下：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念倡导及实践探索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达到了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教育界和教育思想界的高峰，是中国五四一代教育家留给我们后代的宝贵思想遗产，也是中国教育界奉献给世界教育界的不可多得理论财富。^①这一本土原创教育理论体系既是陶行知继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成果，也是推动我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教育遗产。

（一）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蕴

自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②以来，这一命题的使用频率迅速上升。在陶行知研究领域，也要根据现实需要，对其教育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陶行知当年所处的“教育救国”背景不同，当前处于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新时代。尽管教育在不同历史阶段担负的具体任务随着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进程而有所不同，但在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教育思想这一具体任务上，当代中国教育学人应一以贯之地运用动态、发展、追求的观点激活传统基因。^③因此，需要当代教育学人肩负起激活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学术创新使命，在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中展现自觉担当与奋进姿态。

教育学是集理论性和实践性于一身的学科，“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是其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的鲜明特质。教育学不是在书斋中写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做”出来的，既包括教育实践之“做”，也包括研究实践之“做”。^④“这要求研究者努力成为既是深入现场的‘实践者’，又是善于思索的‘理论家’”^⑤，将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教育实践相贯通，解决当代中国社会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让理论研究真正服务实践，并在实践中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生命力体现为对当代教育发展的观照和推动，广大教育学人可以将陶行知“重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密切结合社会生活”“打破传统学校围墙”“提倡知情意并重的全面教育”“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和教情出发”等思想主张融入现代教育体系。

（二）“生活·实践”教育对生活教育学说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就是一个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的历史过程。”^⑥陶行知所创立的生活教育学说，是立足中国教育实际的原创性理论，有着自己的教育概念、范畴、思想、观点，不能止步于“继承”和“守正”，还要根据 21 世纪的时代背景与现实语境进行“发展”和“创新”。

① 周洪宇. “生活·实践”教育的要义、意蕴与实施 [J]. 宁波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2 (3): 3.

②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160.

③ 周洪宇, 曾嘉怡. 从“自在”到“自觉”再到“自为”: 陶行知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三重境界 [J]. 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3): 28.

④ 冯建军.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及其自觉建构 [J]. 高等教育研究, 2023 (6): 9.

⑤ 李均. 构建中国教育学原创性理论的方法论审思 [J]. 中国教育学报, 2026 (1): 42.

⑥ 习近平.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 [J]. 求是, 2023 (19): 6.

“生活·实践”教育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实践育人重要指示精神，针对教育与生活脱节、学校与社会脱节、教学与实践脱节的弊端，以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为理论渊源，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教育学为理论基础，以研究实验者自身的长期实践为理论来源，聚焦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素质教育新探索。^①

具体而言，“生活·实践”教育在基本原理、培养目标和理论特质三个维度对生活教育学说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基本原理上，“生活·实践”教育将生活教育学说的三大基本原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迭代升级为六个重要理念（“生活即学习”“生命即成长”“生存即共进”“世界即课堂”“实践即教学”“创新即未来”）。在培养目标上，“生活·实践”教育将生活教育学说注重培养学生的“三力论”（生活力、自动力、创造力）拓展深化为聚焦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六力论”（生活力、实践力、学习力、自主力、合作力、创造力），并基于此进一步提出了教师“六力论”（终身学习力、课程变革力、应用技术力、合作共事力、领导胜任力、创新发展力）、学校（校长）“六力论”（理念引领力、规划决策力、文化塑造力、教学领导力、制度治理力、资源整合力）、家长“六力论”（善于学习能力、乐于倾听能力、勇于引导能力、有效沟通能力、自我调控能力、应用技术能力）。在理论特质上，“生活·实践”教育将生活教育学说的六大特质（“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有历史联系的”）进阶完善为八大特质（“生活性”“实践性”“人民性”“科学性”“发展性”“创造性”“民族性”“世界性”）。

（三）以陶行知教育思想推动学校育人方式变革的路径

目前，我们依托基础教育改革实验，在全国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千余所“生活·实践”教育实验学校中推广“彰显行知理念符号、建设师生共同课堂、善用‘小先生+’教学、采用活动课程教材、构建全域活动空间、组织师生亲子共读、开展三大师生行动、实施教育治理评价”^②八大实施路径，整体推进学校育人方式变革，促进陶行知教育思想在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中的全面渗透与落地转化。

2025 年 12 月 30 日，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负责同志在“教育大会一年间·教改进行时”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人工智能教育和应用有关情况时讲到，2025 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发布的《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系统诠释了中国成效经验，提出未来教师、未来课堂、未来学校、未来学习中心的“四个未来”构想。一批学校有组织地推动人工智能在课堂主战场的规模应用，如清华大学已完成 402 门的课程 AI 建设，系统推动课程 AI 助手应用到课程活动中，构建“师—机—生”三元教学的新模式。在答复《人民日报》记者关于“教育部将如何推进‘四个未来’建设落地见效？”的提问时，明确提出要推动未来课堂改革，“探索构建‘师—机—生’三元协同课堂的新模式”，研制未来课堂建设指南，支持中小学校实现规模化培养条件下的因材施教，推动职业学院和高等学校结合学科专业特色，促进课堂深度变革，全面提升课堂的育人质量。可见，探索构建“师—机—生”三元协同课堂的新模式，已经成为新时代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必然趋势。

自 2025 年年初开始，我们率先提出与推广以“教师—小先生—AI 智能师”为核心架构，以“知—行—创”为教学流程的“三师课堂”，这不仅是“从中国教育实际出发，以本土教育智慧为根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气息的教育新生态”^③，更是在国家层面探索构建“师—机—生”三元

^① 周洪宇. “生活·实践”教育：21 世纪的生活教育 [J]. 生活教育, 2025 (5): 5-6.

^② 周洪宇, 曾嘉怡. “生活·实践”教育：陶行知“生活教育”的继承发展与当代探索 [J]. 教育导刊, 2025 (5): 12-15.

^③ 周洪宇. 发掘本土智慧 助力智能时代课堂教学变革 [J]. 中国基础教育, 2025 (11): 1.

协同课堂新模式的先期实践。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负责同志在新闻发布会上的相关介绍及答记者问充分证明“三师课堂”的提出和推广与“十四五”时期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部署高度契合。“三师课堂”真正的突破在于以源自中国本土、具有原创价值的陶行知教育思想为根本遵循，打破“小先生制”作为一种局部的、补充性的教学手段的功能定位，并将其升级为一种可贯穿课堂全域、支撑课堂结构的核心组织原则，最终实现从单纯“技术应用”到深度“课堂生态重构”的根本性跃迁。^①教师、小先生和 AI 智能师作为“三师课堂”的教学核心要素，具有以下两方面特点。一是三者权责分明。教师统筹目标定位与学程设计，小先生在与同伴共学互教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AI 智能师则为师生提供精准资源服务与实时数据反馈。二是三者多维联动。教师、小先生和 AI 智能师依托“知一行一创”三阶递进式教学流程，营造协同育人的活跃课堂氛围。可以说，“三师课堂”不仅具有坚实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还顺应了人工智能时代我国基础教育课堂教学改革与创新的总趋势，为构建未来课堂、未来学校等新形态、新场景提供了先行探索和落地方案。

三、放眼未来：以陶行知研究助力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陶行知在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不仅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教育体系提供了有益参考，还使广大教育学人在古今对照中认识到自己相较于近代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独特优势与明显不足。在此基础上，以陶行知研究为重要抓手，探寻其思想与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之间的联结点与生长点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

（一）治学根基：提出建立“陶行知学”的倡议

一个多世纪以来，“经过广大陶行知研究者的共同努力，陶行知研究在理论上和实验上都取得了蔚为可观的成绩，正逐渐发展成一门系统的专门学问——陶行知学”^②。“陶行知学”是在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对 20 世纪复合型文化巨人陶行知的专门研究之学，在研究性质上，以基础研究为主、应用研究为辅；在研究门槛上，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一线教育工作者，只要对陶行知感兴趣，皆可开展研究；在研究视角上，不局限于教育学、文化学和历史学，鼓励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学、新闻学、图书馆学和自然科学等跨学科视角的介入；在研究内容上，从陶行知的家世家庭、个人生平、事业贡献、思想学说、人格精神、历史作用和国际影响等多个维度展开，“涉及陶行知本人及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所经历的重要活动和重要事件、所交往的重要人物等，重点是研究陶行知的精神文化世界，对陶行知的历史价值及其局限进行历史反思”^③。提出建立“陶行知学”的倡议既是陶行知研究百余年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自主发展本土学术文化，提炼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标识性概念，助力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客观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多次强调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将这一任务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为教育学领域的本土化学术研究与原创性理论建构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丰富的教育实践中，把所蕴含的中国特有的理论、思想、范式、模式、制度提炼和总结出来”^④，推动那些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和实践检验的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

^① 周洪宇，杨朝晖，操太圣，等.“三师课堂”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样态（笔谈）[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1）：11.

^② 周洪宇. 陶行知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2）：5.

^③ 周洪宇. 今日我们为什么需要建立“陶行知学”？[J]. 教育科学研究，2016（12）：6.

^④ 李永智，马陆亭，姜朝晖，等. 中国教育学论纲 [J]. 教育研究，2023（4）：7-8.

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提供学理依据和思想支撑。在新时代、新形势下，自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学知识体系，是当代教育学人的职责使命。将陶行知研究发展成专门学问，正是这一职责使命在陶行知研究领域的生动实践和主动作为。当代教育学人有义务、有责任在前人的基础上接续前进，吸引更多专家学者、一线教育工作者等参与进来，共同努力，协同创新，推动陶行知研究的专业化、系统化与科学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陶行知研究将迎来新的突破，“陶行知学”也将在学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为中国教育学术事业的繁荣发展和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有益参考。

（二）方法引领：以“四大思维”深化新时代陶行知研究

陶行知提出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等一系列教育经典语录，不仅是他伟大人格和崇高师德的鲜明体现，也是中国本土教育家的精神标识，更是当代教师的理想标杆。^①陶行知教育思想中蕴含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与实践智慧，为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养分。

具体而言，当代教育学人需要推动陶行知研究向纵深发展。其一，以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擘画新时代陶行知研究的发展蓝图。将陶行知研究与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精准对接，紧扣中国式现代化与强国建设目标，回应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议题，将“师生共生活”“共学、共事、共修养”“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念和“小先生制”“幼年研究生制”“工学团”“艺友制”“旅行修学”“分组教学”等具体方法切实转化为突破当代教育困境的方案。其二，以贯通古今的历史思维，探寻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生成脉络与时代根基。立足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交织渗透的历史环境，开展“原生态”的陶行知研究。其三，以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厘清陶行知研究中涉及的多重关系。系统梳理和深入剖析陶行知思想、文化与精神等内在演进脉络与外在社会现实的矛盾，避免陷入主观臆断的误区。其四，以与时俱进的创新思维，激活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生命力。“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②，发展是对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最好的继承，但“真正的继承不是表面的、形式的继承，而是全面的、再生的、创新性的阐述”^③。

（三）核心抓手：锚定“十大理论维度”和“八大实施路径”

要想使陶行知的思想学说、人格精神与实践智慧真正转化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源泉，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持续发力。在理论方面，其一，解读陶行知“教育是立国的根本”思想与当代教育强国建设的内在契合性；其二，剖析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原理与当代教育本体论、场域论和方法论的内在关联；其三，探讨陶行知的教育目的观与当代“五育并举”理念的关系；其四，挖掘陶行知的生活课程理念对当代课程论研究的参考价值；其五，研究陶行知的创造教育思想赋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路径；其六，阐释陶行知的终身教育理念对当代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的启示；其七，挖掘陶行知“知情意合一”思想与当代情感教育发展的关联；其八，梳理陶行知“政富教合一”理念与当代整体教育观的关系；其九，总结陶行知的系统思维方法对当代教育思维方式革新的借鉴意义；其十，考察陶行知

^① 周洪宇，曾嘉怡. 弘扬教育家精神，做行知式大先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论教育》的体会和思考 [J]. 中国教育科学，2025（3）：34.

^② 习近平. 论教育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28.

^③ 周洪宇. 继承与发展：从生活教育到“生活·实践”教育 [J].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3）：4.

的精神人格与弘扬教育家精神、培养高水平教师的融合路径。

在实践方面，可重点依托“生活·实践”教育的八大实施路径，采取以下具体举措。其一，彰显行知理念符号，将陶行知的思想主张、精神人格等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创新实践；其二，以“三师课堂”为关键抓手，将“师生共生活”“共学、共事、共修养”教育理念及“小先生制”教学方法与人工智能有机融合，赋能基础教育改革的创新实践；其三，善用“小先生+”教学，将“教学做合一”和“小先生制”作为学校教学理念、组织形式和方法的创新实践；其四，采用活动课程教材，将“生活即教育”作为学校深化课程教材变革的创新实践；其五，构建全域活动空间，将“社会即学校”作为拓展学校育人空间的创新实践；其六，组织师生亲子共读，将“工学团”“共学营”“艺友制”“幼年研究生制”等理念作为构建学习共同体、教育共同体的创新实践；其七，开展三大师生行动，将“小先生”“传递先生”和“大先生”等理念作为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走深走实的创新实践；其八，实施教育治理评价，将陶行知的民主管理思想、学生自治理念作为学校现代教育治理评价的创新实践。

20世纪上半叶，陶行知潜心耕耘、笔耕不辍，扎根中国大地提出了概念清晰、原理明确、主张具体、内容丰富、结构完整的生活教育学说，为建构本土化教育理论体系进行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探索。当前，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也应该以陶行知研究为重要抓手，深入挖掘和系统阐释其教育思想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蕴，沿着他当年开辟的道路继续探索前行。

（责任编辑 平 悦）

Research on Tao Xingzhi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Pedagogy in China

Zhou Hongyu, Zeng Jiayi

Abstract: Culture and education are inherently intertwined and mutually infiltrative. Culture serves as the root and soul of education, while education acts as the carrier and channel for culture. Looking back, Tao Xingzhi, with a strong sense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education consciousness, integrated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 modern educational theories and eventually established the highly original life education theory of modern China. At present, explo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hool education under the concept of “life-practice” education is conducive to promo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ao Xingzhi’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In the future, scholars and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should take “Tao Xingzhi theory” as academic foundation,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systematization and scientization of research on Tao Xingzhi, uphold the four major thinking methods, and anchor in the ten theoretical dimensions and eight implementation paths, so as to inject spiritual nutrients and practical wisdom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pedagogy in China.

Key word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life education theory; research on Tao Xingzhi; pedagogy in China;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